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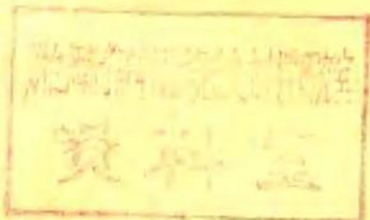
312

宜宾文史资料选辑

1982 第二辑

(总11)

〔工商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宜宾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宜宾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工商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宜宾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部发行)

宜宾文史资料选辑

1982年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宜宾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2年2月出版

宜宾地区印刷厂印刷

本期定价： 0.60 元

前 言

自一九五九年四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招待六十岁以上委员的茶会上提出“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的亲切教导以来，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在全国各地政协普遍展开。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发展，文史资料工作也增加了新的内容。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全国政协第三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纪要》中着重指出：“我们不仅征集革命老同志的资料，还要特别重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原工商业者和宗教、民族、华侨等各界人士提供的资料。这样，才有利于发扬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长处和特点”。这就给我们明确指出：做好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对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各界人士，进一步调动积极因素，为四化事业贡献力量，具有重大意义。我会遵循上述精神，在中共宜宾市委的关怀重视下，市民建、工商联两会的配合和部份工商界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编印了《政协宜宾市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工商专辑》。

本期选登了有关工商史料共八篇。大体分为三个方面：一，解放前我市规模较大、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工商企业的创办和经营管理情况；二，解放前我市部份重点行业发生发展和变化情况；三，解放前后我市出产的或经由我市集散的大宗土特

产品的生产发展情况。上述资料都是供稿同志的亲身经历，亲见亲闻，内容比较翔实。

汇编中，由于我们经验不够，水平有限，加以编审时间仓促，片面失误，在所难免，欢迎提出质疑，批评指正。

一九八二年一月六日

目 录

黃殿民

我知道的“天原化工厂”

十四年（1935—1949）工作中的见闻

（现改名为宜宾化工厂）

叶世强

宜宾天原化工厂，在1944年开始筹建，1946年正式投入生产，迄1949年解放，历史不长，规模不大。但天原化工厂股份有限公司同它的“姐妹”工厂，在工业落后的旧中国，惨淡经营，确曾经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奋斗过程，并在提倡国货这方面创造过一段光辉历史。笔者曾先后在上海、重庆和宜宾天原化工厂工作，爰就回忆所及，记述片断。

一、“天字号”工厂

解放以前，中国的化学工厂，亦象其它工业一样，为数极少。基本化学工业，在全国范围内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当时化工企业家吴蕴初和范旭东两先生，办厂较为成功，因他们分别建厂在长江南北，时人对此两位化工界巨头有“南吴北范”之称。

抗战以前，吴蕴初先生所办企业都在上海，计有天厨味精厂，天原电化厂，天利淡气制品厂和天盛陶器厂。当时工商界誉为“天字号”工厂，不仅因企业的命名，都冠有一个“天”字，同时还有赞美的涵义。

吴蕴初先生毕业于兵工专校，娴悉化工。大革命前后，鉴于日本舶来的调味品“味〇素”充斥市场，利权外溢，难以胜计。吴先生悉心研究试制成功一种调味品，名之为“味精”。旋得从事酱园业的资本家张逸云先生投资入股，筹办了天厨味精厂合伙公司。吴蕴初先生以制造味精的技术配方作投资五千元入股，并订约规定以销售味精一磅提取一角钱作为味精发明权益的特酬。这笔特酬为数甚巨。吴先生不仅以此在天厨味精厂逐年增加投资比例，发家致富，从空头的“吴老板”转化为名符其实的“吴老板”。他还在几年之后，以该项特酬移充“天厨奖学金”和“清寒奖学基金会”的基金，替清寒学生就读大学支付费用，扶植和培养了不少的人才。

日货“味〇素”曾以“价廉物美”为号召独占我国市场，吴蕴初先生仿制成功，设厂生产后，迭遇抵制日货的机会，因起而代之。制造味精的技术，初时极端保密，在私有制社会、勾心斗角以争利，手法是层出不穷的。吴先生虽故弄虚玄，以淀粉染上颜色、搓制成丸，称为“催化剂”交其亲信掌握，以防他人仿造，但仍被另一资本家以投资入股为手段，打入天厨味精厂取得制造味精的“密方”后，即退股离开，自行制造另一种调味品问世。由于有利可图，同性不同名的调味品相继出现，如“观音粉”、“味母”、“味宝”等名目繁多，实质为一。由于调味品一时的利市，竞争非常剧烈。“九一八”事变后，伪国民政府曾经号召献机抗日，吴先生即捐献飞机一架（因承制的意大利公司交货试飞时发生故障，另增加小飞机一架作赔偿，故共为二架），以“天厨号”命名，一时轰动全国，各类报刊竞相转载。这不仅给“天厨”味精作了一幅全国性的免费广告，也给吴先生本人投下了一笔不小的政治资本。

制造味精需要盐酸和烧碱，当时没有国货，盐酸是从日本进口，烧碱取给于英国“卜内门”，这不仅贬低了味精是“完全国货”的实质，更重要的是供应和成本受到很多限制。因此，吴蕴初先生决心创办电解食盐化工厂，以解决味精原料的自给问题，并将该厂定名为“天原”。适海防有一家电解食盐工厂停产，出售全部设备，乃由天厨味精厂大量投资，筹备“天原电化厂股份有限公司”。以吴蕴初先生兴办天厨味精厂的声誉，集资较易，因将海防食盐工厂的全套设备买回，建厂于上海长宁路，并将该厂法国籍工长，请来当工程师，订立三年合同。这样既买得了整套生产设备，又吸取了他们的技术经验。在旧中国这是资本家走生产捷径的道路之一。吴蕴初先生是公司的总经理，亦是工厂实际工作的总技师，重大的技术问题他都参加意见，主要的操作他亦亲自动手去作。当时有这样一种传说：“信奉佛教的总经理在亲自点燃盐酸炉之先，终要默向苍天祝祷，保佑他胜利成功”。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当时极受帝国主义的压抑。英商卜内门洋行的烧碱，独霸我国市场，天原烧碱的推销，常受该行的跌价打击。由于双方经济势力相差悬殊，中国工厂又得不到政治上的保障，价格完全操纵在帝国主义魔掌之中，很难与它竞争。天原电化厂为了生存，不得不暂时采取妥协办法，付出“经销费用”，将烧碱交卜内门洋行代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参与反帝斗争，上述情况是其根源之一。天原电化厂虽然受到这些压抑，但以烧碱、盐酸、漂白粉等产品，当时在国内都是首创生产的化工原料，因而工厂发展的速度还是比较快。股本从1927年二十万元，经过了四十万元、七十万元等几次增资（大部份是以红息来增，也就是以劳动生产的剩余价值增加

资本家的股本的阶段)，一直到抗战时的一百零五万元。主要生产设备，如直立隔膜式的电解槽，由开工时的五十只逐步增加到三百只。各种产品的产量，相应也有很大的增长。

天原电化厂生产的氯气和盐酸是腐蚀性很凶的气体和液体，输送管道同盛装容器都需要耐酸陶器，国内没有生产。向日本法国采购，不仅价格高昂，供应亦难保证，自力更生设厂生产，则耐酸陶器是一种冷门货品，销路不广，利润不高，非一般资本家乐于投资。吴蕴初先生乃拨出天原电化厂一部份资金，在上海龙华镇筹建一所“天盛陶器厂”。建厂方法还是以采用国外技术的方式，重金聘请一位法国籍工头，充当该厂技师，同时派本国工人与大学生随同生产与学习。迄抗战开始时，该厂产品已能媲美舶来品，经济上亦能自给自足。

吴蕴初先生在办以上三个企业成功后，经济上有了基础，社会上有了声誉，政治上有了地位，加以自己出身兵工专校，且赋性勤劳，受欧风美雨的影响，有创建化工“托辣斯”的雄心，故想兴办一个同国防有关的工业。1933年，由欧美考察回国后，就决定创办一所从空气中提取淡气、从水中电解出氢，以制造阿莫尼亚（液氨）及硝酸的工厂，集资100万元，筹建“天利淡气制品厂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的苏州河北岸。建厂方式仍是购买美国停产工厂的设备，雇请美国工程师，吸收国外技术的老捷径。但该厂机器设备比较复杂，安装工程部份包给外商洋行承办，费用较大。资本主义生产经营完全无全盘计划。1935年初，部份设备还未安装，公司资金业已用罄。增加股本，股东不同意，向银行借债，则要抵押。吴先生首则向天原、天厨二厂借用资金，后则以他个人所有天厨、天原股票向银行抵押，终于渡过了难关。1935年秋工厂开工后，吴先生曾指指他的手枪说：

“现在好了，工厂已开工，银行肯借钱了，在上海这种环境中办工厂、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我这次几乎为天利而牺牲”。天利液氨制品厂投产推销时，又碰上帝国主义竞争的局面，生产的液氨是冷冻机用的冷冻剂，当时国内的冷冻机几乎都是约克洋行经售的，规定要用约克洋行的液氨。天利的产品，质量与进口货相等，价格虽比进口货便宜，但限于“清规戒律”，无人敢于试用国货。吴先生深知单枪匹马同帝国主义斗法，得不偿失，只好与约克洋行订约，将天利厂的产品钉上“约克洋行制”的牌子，交约克洋行销售，支付5%的佣金。天利厂另一种产品硝酸，是兵工厂制造火药同颜料厂制造颜料的原料，理应在工厂与工厂之间直接订约供销，但在旧社会，佣金等陋规甚多，吴先生又不愿随波逐流，迁就其事，因而大部份硝酸都交原料商经销。这样天利厂的利润率就远不能与天厨、天原相比。1935年，由于销路尚未打开，不但无利可图，还亏了些本，经过奔走活动，南京伪财政部批准了奖励国防工业一案，拨给了天利厂十万元奖励金。这个厂生产能力是日产液氨四吨、硝酸二吨。到抗战开始那年，亦已克服了种种困难，达到了可以分发股红利的地步。

天原电化厂为天原化工厂的前身，因各姐妹厂相互关联，爰赘述以清来龙去脉。

二、抗战内迁

1937年，伪资源委员会拟筹建人造汽油厂于江西，由吴蕴初先生率领代表团去法国参观，并洽商委托设计和供应设备。

“七·七”事变突起，伪资源委员会密电促订草约，召代表团归国，吴先生乘机飞回。时伪资源委员会已在上海成立“工矿迁

移监督委员会”，负责人是林继庸先生，监督当时认为比较重要的厂矿内迁。天利淡气制品厂有关国防，伪迁委会意图速迁，但目的地是武汉、南昌、洛阳、郑州，何去何从，并未确定。当时上海比较进步的资本家，对于工厂内迁的心绪是复杂的，既不愿留与敌人合作，同时对抗日前途缺乏信心，犹豫动摇，不能果决，充分表现着阶级的动摇性。对这一问题吴先生是比较走在前面的，但亦不是全力以赴毫不动摇的。

抗战烽火，绵延上海，“八、一三”后，苏州河两岸，迭被轰炸。天利、天原两厂首将主要生产设备陆续迁入“租界”，冀借外力庇护一时。由于全民敌忾同仇，抗日战争短期不能结束，加以伪迁委会催促等客观因素，内迁问题不得不作决定，但“因循观望”等态度仍时流露。四厂职工则冒敌机盘旋上空之险，漏夜赶工、拆卸机器，体现着工人阶级高贵品质与爱国热忱。

沪战时，江阴封锁，内迁之路，只苏州河一条，庞大机器，舟楫不能载运。尤以伪国军节节败退，三阅月上海即遭沦陷，时间短暂，拆卸大量设备，亦存在困难。天利淡气制品厂的仪器仪表及主要附件，如白金丝钢等，虽已折运、达到了不为敌人利用之图，但迁出物资重新建厂以更生，亦不能实现。附翼内迁的天厨味精厂有全部的配套设备，天盛陶器厂的可移设备亦全部迁出，天原电化厂则迁运了重要材料及部份设备如电槽、变压器、变流机等，其他主要设备如锅炉蒸发器、变流器等仍在“租界”临时仓库保存。一面响应不以物资资敌的号召，同时留有余地，必要时在上海有恢复生产之实力。内迁物资由苏州运至江都仙女庙，换载较大船只溯江西上，以武汉为目的。正当迁运之际，上海沦陷，江阴失守，镇江放弃，南京、

安庆、芜湖相继为敌人占领，噩耗频传。以国防工业招牌靠伪资源委员会主持人斡旋，经伪军事委员会第三部批准，拨给“迁建补助费”伪法币四十万元而成立的天利、天原汉厂筹备处，也无法在汉口立足。以天厨味精厂名义在汉口江岸收购的建厂地亩，亦只好放弃、再向西行，迁建确定为重庆。在后方将天原电化厂建立起来的决心，吴蕴初先生似下定于斯时。因天利淡气制品厂无法更生，当时环境、天盛陶器厂不能离姐妹厂以生存，如无盐酸供应，天厨味精厂亦不能生存。为了有效利用“迁建补助费”维持个人的社会声誉，惟此一着为高。借租界庇护的新设备一锅炉、蒸发器、由香港运上海不久，又由上海“租界”运往香港，经由粤汉铁路运至武汉。“凤浦”轮为武汉沦陷前最后离港船只，当她承载锅炉、蒸发器离开武汉时，押运人员已能遥望敌攻烟火。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解放前交通情况，确是如此。

“天字号工厂”的大量设备器材，赖木船迁运重庆，不得不在宜昌、万县等地设办事处办理转运。扬子江在四川一段、明滩暗礁，骇浪惊涛，因而承运船只迭遭海损，由于职工奋勇抢救，物资并无损失。

汉口撤去天利、天原汉厂筹备处招牌以后，重庆第一模范市场状元桥街一号浮雕“天原电化厂”五字，成立了办事处。与此同时，重庆化龙桥对岸江北猫儿石，亦大兴土木。天原电化厂四川工厂奠基于此。天盛陶器厂则为该厂的一个车间。另外划出部份地亩赁予天厨味精厂四川工厂。至1940年9月该厂等先后投入生产。天利淡气制品厂的器材，都作为储藏的仓库物资，“专库保管”。

光阴荏苒，建厂时间虽不长，但遭遇亦多坎坷，经济来源多

数依靠贷款，拮据非常。资本主义的经营，政简兵精，不宜裁减。小处着手，对职工减半支薪。伪法币贬值情况亦正开始，因而部份技术人员和行管人员相继辞职。就该企业而言，确是一项损失。

积极在重庆建厂的同时，吴蕴初先生不仅没有放弃对上海天厨味精厂的领导，并且还大力筹划将味精向国内外市场推销的道路。方法是从上海搬迁一部份天厨天原的设备，在香港新建一所天厨味精厂香港分厂。这厂大约是1939年开工生产。这样抗战八年，“天字号”四个工厂都起了巨大的变化。天利淡品厂停顿了，天盛陶器厂合并了，天厨味精厂分化成上海、重庆、香港三个工厂，天原电化厂亦在上海、重庆、宜宾三地重建成功了。

天原电化厂四川工厂（即今天的重庆天原化工厂），生产初期，产品积压，销场疲滞，乃千方百计，打开销路。即吴蕴初先生本人亦曾到重庆澡堂茶馆，漂白毛巾以为广告，直至夹江、广安、铜梁等手工造纸区采用漂白粉以代替德国进口的“依里登”漂粉精后，天原电化厂的业务，渐次繁荣。

三、“公私合营”

1937年迁厂以来，参予建厂职工，不辞劳怨，不避艰险，甚至为迁建而牺牲。多数股东未曾目击，反以几年未领股息而散布流言，影响吴蕴初先生在上海的声誉。因此认为小股东无助于工厂，反而增加麻烦。弱肉强食、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办法，以存放上海的天原电化厂的设备，全部卖给金城银行，由金城银行收购天原电化厂的另星股票，而成为天原电化厂的股东。公司改组，更名为“天原电化工厂股份有限公司”，仅就原名增加了一个“工”字。资本定为法币500万元，公司地址

亦改设重庆。

重工业资金周转较慢，生产利润较低。金城银行踏进“天字号”的重工业工厂以后，冀再染指于轻工业工厂，乃建议生产面粉，以供应天厨味精原料。旋由天厨味精厂与金城银行合资，建厂于天厨味精厂后边，命名为“天城面粉厂”。

金城银行主要代表人代自牧先生兼任天原电化工厂和天城面粉厂两公司董事会董事长，吴蕴初先生任两公司总经理。工厂较大，具体事项未经董事长首肯，总经理不能实现欲为。

“小股东的话难听，大股东的脸难看”，常流露总经理的言表。资本主义社会的勾斗争夺，由此可见。

由于各有所图，发生了矛盾。为了不看不大股东的脸色，在企业里能遂欲为，征得几方面同意之后，由伪资源委员会收购金城银行所有的天原电化厂股票而组成了当时的所谓“公私合营”，实际是官僚资本打进了天原电化厂。

四、叙厂的诞生

天原电化厂四川工厂（简称渝厂）投产以后，由于抗战时期交通阻梗，西南一隅，电解工厂，只此一家，业务逐步兴旺。1942年起，经常供不应求。为了降低成本、追求更多的利润，原拟扩充渝厂生产设备，但当时重庆的客观条件，电力供应不足，实行分区停电，再增负荷，环境不许。加以日帝飞机侵扰频繁，渝厂厂基之上已有轰炸的弹坑，安全堪虑，经营者思想上酝酿另觅地址筹建分厂。

宜宾是中小城市，远处西陲，日帝飞机侵扰的机会较少，比重庆“安全”。宜宾电厂由武汉迁来的六千瓩汽涡轮发电机，正在安装投入生产，将有大量电力多余，不仅当地中元造

纸厂是一个很好的销售对象，就是距离手工业造纸区乐山、夹江也近。另外传说当时国外进口有一批电解槽用的石墨电极，业已运到昆明，中元造纸厂准备全部买进，筹建电解食盐工场，以自给造纸原料，果尔，对天原电化厂“托辣斯”将有很大影响。这些情况，就促进了宜宾天原电化厂（简称叙厂）的诞生。

伪资源委员会对宜宾天原电化厂的筹建曾极力支持。选择了宜宾下游五公里长江北岸的蒋坝为厂址。购地七十八市亩有余。机器设备分别出包给宜宾机器厂，重庆张瑞生铁工厂。主要供电设备原拟从滇缅路进口一台美制汞整流器。旋以抗战胜利，改由上海运来变压器及变压器一套配用。初期拟投资的伪法币二亿元，预计投入生产后，两三年就可收回资金，届时看“局势”再作打算。因此一切因陋就简，根本谈不上“百年大计”。建厂期间，物价日涨，币值日贬，延期交工交货，要求调整包价的纠纷迭起，土建工程有停工半年复工的。当日帝进犯贵州，图扰四川的时候，人心惶惶，职工也难安工作，筹建工作几乎功亏一篑。经过了若干波折，迄1946年12月23日才正式投入生产。

抗战期间，叙厂是天原电化厂四川工厂的分厂。胜利后天原总公司迁回上海，叙厂、渝厂及沪厂（现名燎原化工厂）乃平属于总公司。叙厂分设工务、财务、业务三科及总务、材料二股。全厂职工总人数最多时亦只百余人，最少时仅八十四人。公司规定重大事项，由厂长召开厂务会议决定，并口头约定厂务会议可以讨论全厂一切事务，但人事及工资问题应按公司指示办理，不在讨论之列。叙厂工薪一般按渝厂规定比照办理。44年到49年，工薪支給标准虽采用过按工薪基数乘倍数，按营业额提

1—2%作辅助金等方式，但以币值变动过巨过快，重庆通知四五天邮递到叙，伪币实值已跌，职工受损非浅。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内战，政治上处于苟延残喘的末日，经济上处于总崩溃的边缘，工商业亦随之失常。守法者生存维难，投机者反获暴利。叙厂开工之日，正值上述“惊风骇浪”时间，工厂时开时停，产销极不正常。旋因伪币两度变制，中元造纸厂承揽了钞票纸的生产，从而叙厂“畅销”了两个短暂时间的产品，获得了一定的利润。当时只有二种产品，——40布美的烧碱（49年曾制造了小部份固体烧碱及肥皂）及35%的漂白粉，几年的产销情况如下：

年 份	漂 白 粉		液 体 烧 碱		固 体 烧 碱	
	产量(吨)	销量(吨)	产量(吨)	销量(吨)	产量(吨)	销 量(吨)
1946	37.6		48	—	—	—
1947	787.7	717.6	1381.9	1341.4	—	—
1948	637.1	581.2	1636.9	1511.5	—	—
1949	122.5	68	157.6	228.3	125	69

工厂既难持续生产，外界变迁又巨，经营注意力就集中在资金的调度与使用，忽视了管理制度的建立。经常留心“存货不存钱”，“留硬不留软”，以免不能继续再生产。收入货款或预付原燃材料价款，或交美丰银行无息兑成银元，或调往申、渝运用。迄解放时，不仅厂内存有硬币万余元，调往上海总公司及渝厂的现金，已远远超过投资总额。

天原、中元两厂毗连，又有密切的供需关系。但资本主义